

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考

陈 芬¹, 苏新宁²

(1.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4; 2.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情报学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对我国情报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 介绍了情报学的学科体系、领域和研究热点, 以及学科融合状况。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目前的问题包括理论基础薄弱、在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领域没有发挥支柱作用和情报工作的不足等。最后, 对情报学学科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思考, 提出了学科未来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包括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并行发展与交叉融合以及学科地位的提升等。

关键词 情报学; 学科现状; 学科发展; 情报学未来; 学科建设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oughts about Future Development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Chen Fen¹ and Su Xinl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has led to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troduces the discipline system, and examines the hotspots and discipline integration in this field. The primary problems, including weak theoretical foundation, lack of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sufficient intelligence work, are also analyzed in this paper.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are also considered, which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development path,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Key words: information science; current situati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utur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1 引 言

情报学的概念源于欧美西方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 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我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为一级学科, “情报学”是其下的

二级学科^[1]。我国的情报学创建于1978年, 迄今为止已经历了40年的发展历程; 如果以情报工作实践作为学科发展的起点, 其发展历史则已达到60年左右^[2]。

目前, 我国情报学的本科专业虽然已被取消, 但研究生专业的发展却非常迅速。2017年, 教育部

收稿日期: 2018-04-04; 修回日期: 2019-07-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17ZDA291)。

作者简介: 陈芬, 女, 1977年生,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信息处理与用户行为研究, E-mail: lanyan_js@126.com; 苏新宁, 男, 1955年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智能处理与检索、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

新增了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我国拥有情报学博士招生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原来8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河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还有许多学校将情报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挂靠在如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其他学科。

从国际视野看，与我国“情报学”对应的学科为“Information Science”和“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然而，受内外部因素影响，情报学学科发展至今仍未很好解决核心理论不成熟、认识不一致等影响学科发展完善的问题^[3]。

2 学科领域

2.1 学科体系

学科是按科学领域性质不同而划分的学问门类，学科体系是学科的总体框架，它描述了学科内的基本实体及其间的复杂关系^[4]。

王知津等^[5]认为情报学学科体系是情报学的若干基本内容与其各自下位领域内容按一定层次组合的结果，它能揭示情报学的基本对象和研究范围及其内在诸要素间相互关系之质的规定性。靳娟娟^[6]认为，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研究的是情报及情报过程的形成与发展的最一般特征和过程，揭示的是情报及情报过程的最一般规律，构建的是情报学最一般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因此，情报学应有自身的学科结构，且自身的学科结构应包括理论部分、技术部分及应用部分。田杰^[7]总结了学者们关于情报学的学科体系论述，认为它是情报学若干基本研究内

容及其各自下位领域内容，层次性及整体性是外在体现；在此基础上，他综述了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成果并论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在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视角下界定情报概念并提出统一“信知-谋情-决行”的新的情报学学科体系。赵冰峰^[8]依照认知对抗理论，利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提出了综合创新的学术道路，构建了现代情报体系，并依此阐述了现代情报学的概念、学科特征、研究方法和研究架构等。纵观现有研究^[6-9]，学者们多从理论、技术和应用等角度构建情报学学科体系，如图1所示。

2.2 主要研究领域

近年来，情报学研究呈现学科领域不断扩大、热点逐渐增多的趋势。

1) 学科领域

不同学者对情报学的学科领域做了不同概括。

沙勇忠等^[10]提出了情报学研究的主题分类表，包括11个一级类日和83个二级类目。其中，一级类目涵盖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加工处理与信息组织、情报检索、情报服务、情报技术等领域。

焦为为^[11]从研究生专业方向的设置角度，概括了情报学的基本学科领域，按开设的学校数量统计，信息资源管理在高校中开设得最为广泛，后面依次为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情报学理论、知识管理、信息政策、信息咨询和信息分析等。

王小华^[12]从情报学类目修订的角度，展示了情报学的基本学科领域，包括情报学原理、情报学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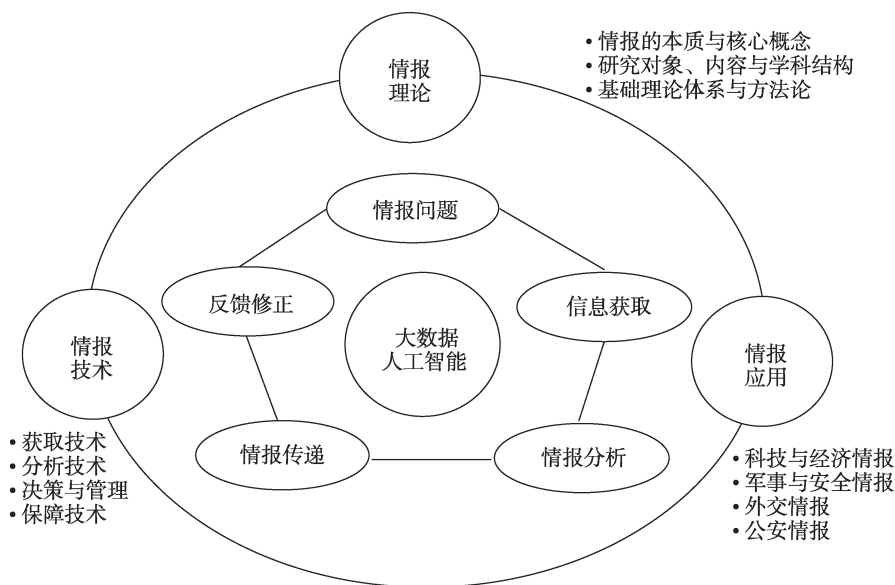


图1 情报学学科体系

究方法、情报学分支（比较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和网络情报学等）、信息计量学、信息经济学和专科情报学（科技情报、社科情报学等）。

2) 研究热点

许多学者采用文献计量法等不同方法对情报学的热点与前言领域进行了统计分析。

王莉亚等^[13]选择了 Scopus 和 Web of Science 共同收录的 38 种图书情报学期刊，利用共词聚类方法，通过 10 年的发文量数据，得出了国外情报学领域的 7 个研究热点，具体包括：①知识管理；②用户技术接受行为研究；③网络环境下用户行为研究；④图书馆研究；⑤网络信息检索；⑥信息政策研究；⑦图书馆馆际互借研究。

李文娟等^[14]使用高频关键词统计以及共现关键词，分析了我国 2006—2010 年的发文情况，发现在这期间我国情报学领域主要关注下面几个领域：①企业竞争情报研究；②情报学理论研究；③知识管理研究；④信息检索，以及本体、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期刊评价、基于引文的期刊评价、信息服务、数据挖掘、搜索引擎等。

朱红艳等^[15]从 Web of Science 下载 7 种情报学代表性期刊的题录数据，发现 21 世纪以来，情报学的 7 个主要研究主题是：科学计量学、网络资源管理与配置、信息检索、信息系统、知识管理、用户交互与服务 and 科学评价。其中，科学计量学、网络资源管理与配置是情报学发展最为繁荣的研究领域。

李信等^[16]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集合，采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得到了大数据驱动背景下的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热点关键词集中于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与语义互联、社会网络大数据、科研大数据管理与共享、云计算与信息安全、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大数据驱动的知识发现、e-learning 与高等教育、数据挖掘与数字人文共 8 个方面。

3) 合作网络

不同学术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反映了学术研究的相互交流和渗透情况。

宗乾进等^[17]通过研究，总结了我国情报学研究合作网络的特征：①武汉大学处于合作网络的中心，与其他多个机构存在合作关系。②“地域性”特点。除了以武汉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大”网络之外，还存在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理工大

学、江苏大学等形成的长三角城市小世界网络，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等形成的北方研究机构网络。

王菲菲等^[18]通过研究发现，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湘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之间存在密切合作关系，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之间的合作关联较强，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两两之间的合作关联强度也是非常高的。

2.3 学科融合研究

中国的图书情报学界从 20 世纪的科技情报转型而来，尽管其核心理论 Information Science 冠以“情报学”之名，但解决的理论问题却是图书馆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与安全和军事学界解决国家安全治理等问题的 Intelligence 理论的学理根基截然不同，根本不存在两大学科整体融合的可能，美国的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19]。虽然不同情报学应用领域的整体融合异常困难，但由于情报学在科技、经济、安全、外交、军事和公安等众多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一些学者还是试图从某些角度进行不同领域情报学的交叉融合研究。

包昌火等^[20]分析了信息、知识、情报、情报学、中国情报学等基本概念，提出了中国情报学应树立总体国家情报观，构建国家情报学说，并倡导建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建立国家安全与情报智库。

濮方圆^[21]运用比较研究、归纳演绎等方法，总结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军民融合的三种基本路径，即军为民用、民为军用和军民情报一体。以色列的部分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赵冰峰^[8]指出，在学科发展上，研究国家安全治理等问题的情报学与图书情报学应该采用并行式发展与交叉式融合路径，从而将学者们规范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内，解决学科分歧的同时在交叉领域创建出理论生长点。他同时还提出，国家应在制度上采取措施以加速现代情报学的发展，包括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建设一批高等情报学院，设立一个全国性情报学术专业委员会，设立一支国家级学术研究专项扶持基金，以及在北京大学和国防大学建立两个国家级情报与安全智库等。

总的来说，部分学者虽然提出了不同领域情报学相互融合的思想，但是在具体的融合策略上，还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提出。

3 当前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调研，笔者对我国情报学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阐述如下。

3.1 没有引领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借鉴 Sonnenwald^[22]对当前情报学理论体系发展的论述，笔者将近年来情报学理论体系的研究进展表示如图 2 所示。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近年情报学理论体系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和群体行为理论、评估理论以及情报设计理论。①个体和群体行为理论，包括搜索理论、浏览理论等。其中，搜索理论涉及搜索设计、针对搜索的界面设计以及事件索引等研究；浏览理论涉及用户为什么浏览、如何浏览、浏览的内容，以及浏览的过程、维度、模式和影响因素等研究。用户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推动了人机交互向多通道、智能性、简单化以及自然化等方向发展。②评估理论，涉及两个评估视角——检索平台与系统的评估，以及用户使用效果的评估。主要内容包括相关性理论、文献计量学、交互式信息检索理论以及网络计量学等。③情报设计理论，主要目的是将理论研究和发现用于交互系统的设计决策中，包括借鉴理论、用户阅读理论、设计的创新等。

纵观近年来我国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主要为国外情报学最新理论研究的引入与借鉴。在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的情报学理论创造领域，我国所起的作用还比较薄弱，没有引领世界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国际科技和创新强国的目标是不适应的。

此外，情报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足，主要表现在：①虽然近年来情报学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学者仍然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发展表示担忧，主要包括情报学研究碎片化、聚焦于实践问题而对理论体系构建不足，学科基础理论缺少系统性等^[23-24]。②除在文献（信息）计量、信息检索等领域建立起独有的基础理论外，在其他领域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少有建树，从而导致难以形成重大的研究突破^[3]。③现有的研究主要利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分析理论的研究状况^[25]，这些研究对情报学的理论、原理等缺乏统一而规范的定义，忽视对理论发展与应用的实证调查^[24]。

3.2 在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领域没有发挥支柱作用

1987 年，美国总统里根在给信息科学技术联盟（ASIS&T）的致函中高度赞扬了美国情报学研究对国家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发展信息的收集、存储和转换，你们已经触及每位公民的生活，并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这是因为我们的学识、国家的繁荣，以及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位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依赖信息技术及我们如何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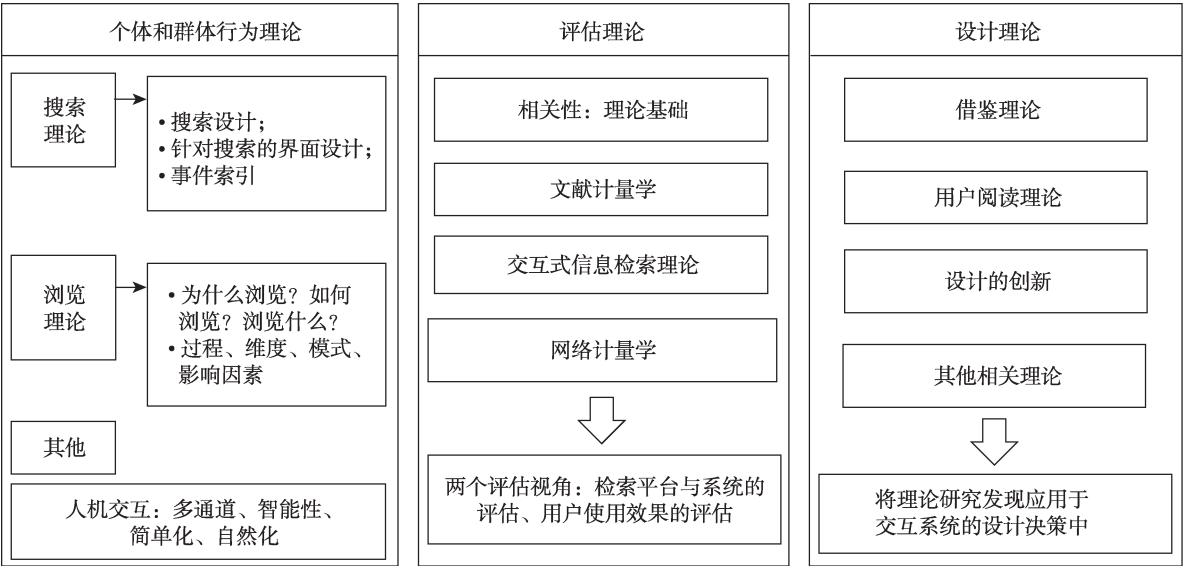


图2 情报学当前理论体系的发展

用这些技术。在知识不断融合的时代,你们的作用至关重要,已经为我们我们的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6]。里根总统对情报学的评价体现了情报学曾经在社会发展包括国家安全领域所发挥的支柱作用。

情报学脱胎于军事情报工作和图书馆学,战争和科技的进步是情报学产生、发展的催化剂,为情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马费成^[2]指出,情报学大发展来自于四大背景:文献学背景、图书馆学背景、现代科学的情报危机或者说情报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这样的发展背景,一方面推动了情报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情报学研究的偏移和摇摆,导致了本学科定位模糊的现状。

体现在实际应用领域,情报学没有发挥支柱作用的重要表现是我国的情报学研究长期与服务实践相脱节。由于受国内历史发展因素和国外图书情报学理论观点的强势影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方向和发展重点始终围绕着公共知识/科学文献的有序化,以及检索和技术利用等方面,不能很好地为整个科技创新过程的情报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也不能适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情报需求和服务实践^[27]。不仅在社会发展领域,在国家安全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1949年以来,我国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曾取得过一些值得骄傲的成绩,如为包括“两弹一星”和航天科技创新等在内的一批重大决策、重要工程项目、重点科研项目发挥了“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27]。但是随着情报学的发展,脱胎于军事情报工作的情报学与国家安全服务渐行渐远,在国家安全领域发挥的作用有限。

体现在学科发展层面,情报学没有发挥支柱作用的重要表现是对其他学科输出的理论和方法不足,辐射力低;其他学科对情报学的了解匮乏,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自然难以借鉴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付诸实践。So^[28]的研究表明,大概有8%的图书情报学文献被其他学科引用。Meyer等^[29]分析数据后发现,约有13%的图书情报学文献被其他学科引用,其中最主要的5个学科分别为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医学、心理学和一般科学。Odell等^[30]采用引文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图书情报学文献有53%的被引来自图书情报学自身,27%的被引来自其他学科。赵俊玲等^[31]通过对CNKI的引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学科辐射强度为25.43%,和其他学科相比,有较

大的差距,并且有辐射强度减弱的趋势;学科辐射广度为0.5303,相对于其他学科,图书情报学学科辐射力广度较小。王芳等^[24]的研究也表明,1991—2015年情报学原创理论在其他学科的应用频次仅占其总应用频次的17.98%,略低于Pettigrew等^[32]的20%的研究结果。

当今的情报学难以发挥应有的支柱作用,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学科凸显的困境。吕斌等^[33]论述了情报学的困难与前景,指出了情报学陷入了难以与其他学科区分以及如何凸显的困境;情报学与其他众多学科关系紧密,这也使得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晰。英国知名情报学家维克利(Vickery B. C.)^[34]在展望情报学未来时,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学术界对情报学学科未来怀有的不确定和不安感,其根源在于认为情报学可能在计算机科学这一大的领域中‘淹没’(消失)”。王芳等^[24]的研究表明,情报学应用的理论70%以上来自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然而其他学科对情报学原创理论的应用并不多。这些都使得情报学的学科凸显十分困难。

3.3 情报工作的不足

赖茂生^[35]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分析了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发展的历程,在充分肯定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已经取得的重要贡献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包括立足于大数据、情报是核心产品、分析即服务,以及研判和洞察力是关键等。

这里,笔者结合目前政府和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的智库研究热门话题,来分析我国情报工作存在的不足。

赖茂生^[35]指出了情报学研究的智库方向,提出情报分析和情报研究分支可以向这个方向靠拢,吸收智库建设和运营发展的经验和知识,按智库的要求来设计课程和培养人才。

李纲等^[36]从情报视角思考智库建设问题,以“服务决策”为主线,从机构关系、外在条件、内在机能、学科关联4个方面探讨情报与智库建设,通过研究发现:①智库与情报机构是合作双赢的关系;②智库以优质的情报资源作为其支撑,智库的数据支持与情报保障能力尤为重要;③情报失察影响智库的内在机能;④情报学是智库建设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情报学与“智库学”有紧密联系。

以上研究都说明了情报工作在国家智库建设战

略中的重要性。根据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37]数据,我国在“外交政策及国际事务”、“国内经济政策”及“全球百强”上都有部分智库上榜。在全球百强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等上榜。但是,无论是从某个领域还是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没有情报机构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国未来的情报工作任重道远。

4 情报学学科未来发展之思考

为使情报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和未来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准确把握当前形势下国家发展所呈现的新特点、新趋势,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科发展道路。我国情报学学科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如下。

4.1 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Lewin^[38]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实用的”。我们的前辈在长期的图书情报研究中提出了许多理论,为本学科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理论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本学科,真正影响整个学界的理论还很少,究其原因,关键是学科的封闭,以及缺乏对这些理论应用范围的阐释^[39]。例如,情报学的三大文献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能够用来解释多种社会和学术现象,还有其他许多来自于图书情报领域的有用理论和实践,但是它们都没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情报学理论体系进行完善与创新,扩展本学科理论的应用范围。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1) 借鉴理论(Appropriating Theory)

Nardi^[40]指出,对现有理论的借鉴是发展新理论的重要步骤,现有的很多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情报学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创新”的方法和模型过多,使得理论间的比较和渐进变得困难。他以自己科研的亲身经历,详细介绍了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对他个人研究的影响,强调了对于早前理论的再发现、再利用是创造新理论的有效方法。作者所论述的活动理论对 HCI 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正彪等^[25]论述了跨学科理论的引入对情报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指出这种引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如何解释情报学的问题;二是将情报学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探索如何用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解和解决情报学面临的问题。

王知津等^[41]论述了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对情报学的影响,分析了情报学哲学各流派的观点,阐述了当代情报学的哲学理论。从中可以看出哲学理论对于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大多数成熟的科学,如生物学、物理学等,围绕广泛、但通用的理论创造了知识共享。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牛顿的物理学理论等。情报学不太可能实现这种趋同,但与此同时,通过关注无形的符号学和有形的技术制品等,努力掌握广泛的、与我们学科相关的理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42]。现有的理论可以直接用于相关工作,也可以作为新的、修正的或扩展理论的支撑。社会网络理论、本体论、组织理论、互信息等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图书情报领域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实践;未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现象学(Phenomenology)等理论将可以进一步与图书情报研究相结合。

2) 理论核心的明确与基础理论的重建

王琳^[43]提出,情报学应将明确自身理论核心作为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他指出,我们并不否认情报学本身的交叉学科特性,但这种交叉特性应是以情报学有着明确的理论核心(本质)为前提的交叉。

彭靖里等^[27]指出,要根据我国未来发展中市场配置资源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逐步将我国的情报学理论研究方向和发展重点,转移到基于 Intelligence 的竞争情报和情报分析的规律、原理和技术以及应用等方面上来。该文章强调了“情报”的核心地位与基础理论的重建。

情报学的理论核心是描述其哲学范畴、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假设的陈述。国外的情报学研究注重从不同的哲学理论角度出发,探讨情报学的基础理论构成,如社会认识论、后结构主义等。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的情报学发展长期以来秉承技术传统,强调实用主义,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显得不足,进展较为迟缓。

理论核心是情报学的根基,如果对其的理解比较含混,则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发展,在与其他学科交叉时容易产生学科边界模糊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明确情报学的元理论,从哲学高度指导情报学的发展;系统梳理来源于本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重构基础理论体系,并通过实践不断加以创新和发展。

3) 理论变革

情报学研究经常涉及前所未有的现象以及以前不存在的人类互动和体验,包括设计、系统、应用、工具、数据和可视化等。典型的例子包括Bush的Memex、Engelbart的NLS^[44]等系统,Grad等^[45]的VisiCalc等应用、PageRank等工具,数据则如Twitter将数十亿条推文视为3D地理纹理(geo-texture)^[46]等,人机交互则如微软的Kinect、Leap Motion^[47]等手势用户互动,这些都是著名的变革性示例。

Carroll^[48]指出了情报学与操作性学习(operant learning)和传统学习的一个显著不同是,情报学受不断改进的、新兴的情报需求和机会,新硬件组件的发展和价格,以及新通信和基础设施的采用和部署等因素的驱动。因此,情报学领域的理论变革与创新表现得更为常态化。近几十年来,影响情报学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异常强大而活跃,它们对情报学影响的周期也在不断缩短。这种快速的社会技术变革或多或少地决定了情报学将主要集中于前所未有的现象的研究。

就我国而言,针对中国国情的情报学理论变革与自主创新还远远不够,大多数理论研究仍局限于传统的图书情报框框之内,鲜有理论研究及其应用的重大突破,鲜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重大创新。

4.2 并行发展与交叉融合,支撑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

社会认识论明确提出,社会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思维”,包括组织层次和社会层次,这些主体可能也存在自身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41]。情报学目前虽然也关注更为宏观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层面的情报问题,但是着眼的层次仍然不够高,依然从个体的角度切入,而没有把它们当作统一的、有机的、会思考的主体来对待。

为了促进情报学学科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将学科的发展目标上升到支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安全层面,走并行发展与交叉融合的道路。

1) 新“大情报观”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情报学的理论发展与西方经典情报学体系相比在研究目标上存在明显差异,它主要是为打破国外全面封锁,更好地实施国家“赶超战略”,尤其是为国防工业等重要行业科技攻关中的科学和技术情报搜集与利用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27]。我国情报学的发展背景要求我们除了关注科技情报,也要关注国家安全战略情报。大情报观适应了我国情报学发展的潮流。

本文的新“大情报观”,是传统大情报观的进一步发展,是将科技情报、经济情报、社科情报、外交情报、军事情报、安全情报和公安情报等连为一体,实现军民情报的相互融合,使情报学具备智库的功能。新“大情报观”着眼于当前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不仅关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架构内、在社会发展战略中如何发挥情报的“耳目、尖兵、参谋”作用,更关注情报学“引领”地位的建立,将情报学的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相联结,与国家安全和创新发展相匹配。

与传统的情报观相比,新“大情报观”更具大局思想,面向的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和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突出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的宏伟目标。

2) 情报学学科的并行发展与交叉融合策略

情报学跨学科特征明显,与许多领域关系密切,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给情报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和研究领域,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方法,使得情报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长期以来,民用情报领域与国家安全情报领域几乎是相互脱离的。由于学理根基的截然不同,图书情报学与军事等国家安全治理领域情报学的整体融合不可行^[19],应该实行两IS(Information Science, Intelligence Science)的融合^[49]。安全情报(或谍报)更适合于军队系统和国家安全部门直属的院校,不推荐地方院校将安全情报作为情报学的主要研究领域^[35]。

综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借鉴两IS融合^[49]、交叉式融合^[8]路径理论,本文认为民用情报和国家安全情报可以走并行发展与交叉融合的道路。一方面,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内,着力发展本领域特有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另一方面,在交叉领域,如情报分析和处理的通用技术领域,可以综合运用情报前沿处理技术,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促进各领域情报分析的共同进步,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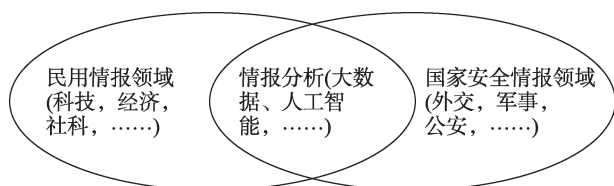


图3 情报学学科的并行发展与交叉融合

4.3 建立情报学学科的“引领”地位

作为一门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学科, 情报学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 我们也要注意, 情报学的发展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这就需要我们关注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在新形势下, 我们要抓住时代发展的脉搏,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机遇, 推进情报学的长足发展, 建立情报学的“引领”地位。这里的“引领”地位, 是指迎合各种战略需求带来的机遇, 针对国家的战略需求, 以支撑战略决策为基本目标, 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科学预测未来, 建设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情报分析智库, 在支撑国家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中发挥中坚作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1) 支撑战略决策的目标定位

美国情报专家 Angelo Codevilla 指出, 情报的本质属性是决策性^[50]。包昌火等^[51]指出, 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 是时代赋予我国情报界的光荣使命和历史重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变革, 为情报学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要把情报作为核心产品, 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决策支持, 解决决策者的信息获取和认知困难, 并通过对战略环境的监测分析、可利用资源的统筹安排、可能机会的识别、危险和困境的预见与破解, 提出有针对性的思路和对策^[52]。

2) 建设有广泛影响力的情报分析智库

2015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明确了智库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智库的决策咨询效用与情报的“耳目、尖兵、参谋”作用如出一辙, 情报学的历史渊源、学科发展、肩负使命等无不与智库建设有相得益彰之处, 互联互通^[36]。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应努力建立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智库, 不仅要支持决策, 未来还要变被动为主动, 在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3) 面向国际竞争的情报学建设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地位不断

攀升, 但同时面临的国际经济、科技和安全竞争也日益激烈。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对情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帮助我国获得经济科技上的国际竞争优势, 支撑我国的经济科技安全实力, 国际竞争情报、外交情报、对外涉华舆情、国际反恐情报合作等研究领域需要我们情报学学者的进一步关注。

5 结 语

情报学的发展需要顺应大数据发展的趋势, 在新“大情报观”的指导下, 结合社会发展的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 研究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趋势, 结合自身实际、探究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和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 把握国际、国内学术发展前沿, 预测情报学未来的研究领域, 发现情报学研究中最先进、最新颖、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 努力形成有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向, 从而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 引领和推动情报学学科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B/T 13745-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S]. 2009.
- [2] 马费成. 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前沿课题[J]. 图书情报知识, 2013(2): 4-12.
- [3] 杨志维. 情报学学科发展现状与问题浅议[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6, 39(3): 1-5.
- [4] 刘洪星, 徐东平. 学科体系结构及其概念建模[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05, 21(5): 58-60.
- [5] 王知津, 李赞梅, 周鹏. 二十年以来我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进展[J]. 图书馆, 2012(1): 50-54.
- [6] 靳娟娟. 普通情报学的学科建设研究[J]. 现代情报, 2010, 30(2): 9-11, 14.
- [7] 田杰. 基于信息-知识-智能转化律视角的情报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J]. 情报杂志, 2013, 32(7): 19-23.
- [8] 赵冰峰. 论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中国现代情报体系与情报学科[J]. 情报杂志, 2016, 35(10): 7-12.
- [9] 马德辉. 论中国公安情报学学科专业发展及研究框架[J]. 情报杂志, 2014, 33(9): 1-7.
- [10] 沙勇忠, 牛春华. 当代情报学进展及学术前沿探析: 近十年国外情报学研究论文内容分析[J]. 情报学报, 2005, 24(6): 643-650.
- [11] 焦为为. 情报学学科核心竞争力研究[J]. 情报杂志, 2011, 30(S1): 1-3, 10.
- [12] 王小华. 学科发展视角下的情报学类目修订讨论[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2): 48-50.

- [13] 王莉亚, 张志强. 近十年国外图书情报学专业研究领域可视化分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战略坐标图[J]. 情报杂志, 2012, 31(2): 56-61.
- [14] 李文娟, 杨国立. 近五年我国情报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情报科学, 2014, 32(1): 104-109.
- [15] 朱红艳, 章丹. 情报学学科结构的 ABCA 及 ACA 对比研究——以 2000—2010 年数据为例[J]. 情报杂志, 2014, 33(8): 76-83.
- [16] 李信, 李旭晖, 陆伟, 等. 大数据驱动下的图书情报学科热点领域挖掘——面向 WoS 题录数据的实证视角[J]. 图书馆论坛, 2017, 37(4): 49-57.
- [17] 宗乾进, 袁勤俭, 沈洪洲, 等. 2001—2010 年国内情报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当代学科发展动向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12(1): 10-15.
- [18] 王菲菲, 田辛玲. 科研合作视角下的国内情报学研究现状与主题结构分析[J]. 情报科学, 2015, 33(11): 112-116, 149.
- [19] 沈固朝. 情报与信息: 一船两夫——读《隐秘与公开: 情报服务与信息科学的追忆与联系》[J]. 情报探索, 2010(2): 3-5.
- [20] 包昌火, 马德辉, 李艳. Intelligence 视野下的中国情报学研究[J]. 情报杂志, 2015, 34(12): 1-6, 47.
- [21] 濮方圆. 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军民融合基本路径研究[J]. 情报杂志, 2017, 36(2): 8-11, 58.
- [22] Sonnenwald 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
- [23] Feehan P E, Gragg W, Havener W, et 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1984 journal literature[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87, 9(3): 173-185.
- [24] 王芳, 陈锋, 祝娜, 等. 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度研究[J]. 情报学报, 2016, 35(11): 1148-1164.
- [25] 韩正彪, 谢丽娜, 周鹏. 北美情报学理论近 20 年研究进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5): 131-140.
- [26] Reagan R. Letter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C]//Proceedings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Program. Washington DC: ASIS, 1987.
- [27] 彭靖里, 李建平, 王澜瑾. 对中国情报学理论与实践错位及其原因的探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4, 37(11): 1-6.
- [28] So C Y K. Citation patterns of cor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An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communication[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8, 15: 236-255.
- [29] Meyer T, Spencer J. A citation analysis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Who cites librarians[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1996, 57(1): 23-33.
- [30] Odell J, Gabbard R.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fluenc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6-2004: A journal-to-journal citation analysis[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08, 69(6): 546-565.
- [31] 赵俊玲, 刘尧. 基于定量分析的我国图书情报学学科辐射力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4, 37(10): 40-44.
- [32] Pettigrew K E, McKechnie L. The use of theory in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52(1): 62-73.
- [33] 吕斌, 李国秋. 情报学的困境和前景[J]. 情报学报, 2007, 26(1): 20-28.
- [34] Vickery B C. Guest editorial meeting the challenge[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8, 34(4): 397-401.
- [35] 赖茂生. 新环境、新范式、新方法、新能力——新时代情报学发展的思考[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12): 1-5.
- [36] 李纲, 李阳. 情报视角下的智库建设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11): 36-41, 61.
- [37] 《全球智库报告 2017》发布, 中国 7 家智库上榜世界百强榜单 [EB/OL]. [2018-04-03]. http://www.sohu.com/a/221435933_774484.
- [38] Lewin K.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1.
- [39]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 情报学报, 2017, 36(4): 331-337.
- [40] Nardi B. Appropriating theory[M]//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 204-221.
- [41] 王知津, 周鹏, 韩正彪. 当代情报学哲学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14, 33(2): 116-129.
- [42] Dillon A. Theory for design: The case of reading[M]//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 222-240.
- [43] 王琳. 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 30 年(1987—2017)的回顾与思考[J]. 情报学报, 2018, 37(5): 543-560.
- [44] Engelbart D C. 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 A conceptual framework[EB/OL]. [2018-09-18]. <http://www.dougenelbart.org/pubs/augment-3906.html>.
- [45] Grad B. The creation and the demise of VisiCalc[J].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2007, 29(3): 20-31.
- [46] Twitter[EB/OL]. [2013-10-20]. <https://blog.twitter.com/2013/topography-tweets>.
- [47] Leap Motion[EB/OL]. [2018-09-18]. <https://www.leapmotion.com/>.
- [48] Carroll J M. Theorizing the unprecedented[M]//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6: 185-203.
- [49] 沈固朝. 两种情报观: Information 还是 Intelligence? ——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的思考[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9(1): 22-30.
- [50]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信息事业 55 年(综合卷) [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 [51] 包昌火, 马德辉, 李艳, 等. 我国国家情报工作的挑战、机遇和应对[J]. 情报杂志, 2016, 35(10): 1-6, 17.
- [52] 李品, 杨建林, 杨国立. 作为科技发展先行者的情报体系理论框架研究. 情报学报, 2019, 38(2): 111-120.